



北京大学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主办

# 国际汉学研究通讯

Newsletter for  
International China Studies

第二期  
2010.10

中华书局

北京大学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主办

# 国际汉学研究通讯

Newsletter for  
International China Studies

第二期  
2010.10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际汉学研究通讯. 第2期/北京大学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  
编. -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1  
ISBN 978-7-101-07763-6

I. 国… II. 北… III. 汉学-研究-世界-文集  
IV. K207.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38773 号

---

书 名 国际汉学研究通讯(第二期)  
编 者 北京大学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  
责任编辑 王传龙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11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00×1000 毫米 1/16  
印张 23 $\frac{3}{4}$  插页 2 字数 350 千字  
印 数 1-15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07763-6  
定 价 68.00 元

---

# 《国际汉学研究通讯》

Newsletter for International China Studies

##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荣新江

委 员(按汉语拼音音序排名):

白谦慎(美国波士顿大学)

程郁缀(北京大学)

程章灿(南京大学)

傅 刚(北京大学)

寇致铭(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

李 零(北京大学)

李 庆(日本金泽大学)

刘玉才(北京大学)

潘建国(北京大学)

齐东方(北京大学)

桥本秀美(北京大学)

荣新江(北京大学)

商 伟(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王 博(北京大学)

汪 涛(英国伦敦大学)

徐 俊(中华书局)

杨继东(美国密歇根大学)

袁行霈(北京大学)

张志清(中国国家图书馆)

赵 超(中国社会科学院)

郑吉雄(台湾大学)

主 编 刘玉才

# 目 录

## 汉学论坛

- 世界史上中国文明的意义 杉山正明 / 3
- Laurence Picken and the Tang musical modes Glen Dudbridge / 12
- 京都高山寺明惠上人高辨与宋代佛教说话 矶部彰 / 18
- 关于朝鲜后期抄本汉语会话书华峯文库《中华正音》 朴在渊 / 42

## 经典论释

- 他者视域下的儒家经典:《孟子》英译本比较研究 刘单平 / 75
- 《三国志》英文选译本评析 何凌霄 / 85

## 文献天地

- 扶桑留珍:日藏六朝隋唐汉籍旧钞本佚存初考 童 岭 / 101
- 九条本所见集注本李善《上文选注表》之原貌 陈 翀 / 125
- 宋刊本《周易集解》的再发现 高田时雄 / 138
- 日本室町时代钞本《论语集解》的研究 高桥智 / 148
- 高丽林惟正《百家衣集》续探 金程宇 / 166
- 关于阮元的两条资料
- 论阮元晚年的思想倾向 李 庆 / 183

红楼其神 燕园其魂 兼收并蓄 洋粹为鉴

——试论北大图书馆有关中国西文珍本的收藏及研究

张红扬 / 193

国家图书馆藏普意雅先生(Bouillard Georges)著作考 彭福英 / 203

## 汉学人物

纪念孟森先生

编者按 潘建国 / 215

孟心史(森)先生遗稿发现记 孙家红 / 216

追寻祖父——孟森 孟庆瑞 / 220

阳湖孟心史著述遗稿捐赠目录 潘建国 孙家红整理 / 227

我所认识的杜德桥 赵超 / 233

被人遗忘的日本人八户弘光

——19世纪60年代中日民间往来的一例 陈捷 / 241

## 研究综览

内藤湖南研究综述(日、中、美) 钱婉约 / 277

中国历代人物传记数据库(CBDB) 方诚峰 / 285

网络时代海外中国研究文献的检索 杨继东 / 299

中国文化史文明史书目(西文、日文、韩文)

陈才智 张剑 柳昌娇 编 / 312

### 论著评介

-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西文汉学珍本提要》序言 张广达 / 323  
洪业及其《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  
——代译后记 曾祥波 / 326  
《剑桥中国文学史》简介  
——以下卷 1375—2008 为例 孙康宜 / 341  
一部值得重视的海外中国学研究新作 张海惠 / 351

### 基地纪事

- 国际汉学系列讲座纪要 基地办公室 / 359  
北京大学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大事记 基地办公室 / 364

### 征稿启事

/ 368

汉学论坛





## 世界史上中国文明的意义\*

杉山正明

**主持人荣新江:**作为北京大学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的一次重要讲座,今天我们特别高兴地请到了京都大学杉山正明教授。杉山先生大概已经出了20本书,可是遗憾的是还没有一本译成中文,是因为里面片假名太多了吗,还是因为我们没看懂,可能这些原因都存在。杉山先生在日本是蒙古史研究第一人,而且在世界学界也是非常有影响的一位大家,对于中国的学生来说,对于我们的研究同行来说,应该非常关注杉山先生的研究成果,他是站在蒙古帝国,放眼全世界,做的非常之宽,我们从今天的题目和星期五的题目(马可波罗的谜团与真相)都会感觉到他的很深的学术底蕴,这个不需要我在这里多说。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有所忽视杉山先生的研究成果,所以我们特别把他从日本请来,用非常集中的两讲来把他近年的、其实许多都是多年的思考讲出来。北京大学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是去年12月7号成立的,由国家汉办和北京大学合作办的一个机构,英文叫 International Academy for China Studies, Peking University(IACS),来推动中国的研究,不仅包括传统的汉学研究,也包括蒙古学、西藏学、中亚学等等,我们虽然前面有几讲,但真正从外国直接请来的杉山先生是第一讲。现在请杉山先生开始。

---

作者单位: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

\* 根据杉山正明先生2010年5月26日在北京大学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的讲演录音整理。

杉山先生：今天看到这么多的人来听我的讲座，真的非常高兴，非常感谢。在这个房间我做演讲是第二次，从现在开始我大概讲一个半小时。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世界史上中国文明的意义”，这个题目对我来说非常难，因为很显然对中国文明的了解在座的各位都比我知道的多。我最近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历史应该成为一种世界史，当然我知道的世界史也是很小的一部分。我懂十几国语言，所以能从许多国家的角度来看中国史，今天我就谈一谈我的感想，演讲完毕后请大家不吝指正。

我先讲一讲中国和日本的关系，北京大学历史系和京都大学文学部签有学术交流协议，北大和京都大学几乎诞生于同一时期，北大是1898年，我所在的京都大学是1897年，早一年。京都大学和北大的老师有很多交流，交流的结果是签订了那个协议。日本有许多学会，其中的东方学会聚集了日本研究中国的学者，日本的学会和中国的学会不太一样，是没有钱的，只有东方学会特别有钱，为什么呢？因为它的背后是日本的外务省。正如大家所知的，中日发生过战争，那是很久之前的事了，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出生。1945年日本战败，当时，中国将来会怎么样还看不太清，外务省就在考虑一个问题：日本之所以战败，就是因为没有与中国搞好关系。当时京都大学的校长是羽田亨，他是个东方学家，主要研究敦煌文献和中亚文献，北大的荣新江先生从学术系统来讲可以看做是羽田亨业绩的后继者之一。当时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是日本的两个中心大学，东京大学的校长不是学文科的，于是外务大臣就委托羽田先生，为了改善中日关系，先从学术交流开始。那时，日本刚刚战败，没什么钱，外务省却给东方学会拨了10亿日元，当时的10亿日元不同于今天，是一笔很可观的投入。当时给羽田先生很大支持的是著名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吉川幸次郎先生。吉川先生通读过中国历代的文学文献，羽田先生要作演讲的话，执笔的都是吉川。东方学会建立不久羽田先生就去世了，后来由吉川先生掌管。50年代中国和日本没有外交关系，吉川以研究中国文学为理由，经常来中国，和中国的一些重要人物会面谈话，特别是与郭沫若。这一半是为了学术交流，一半也是为了中日友好。尼克松访华之前，中国和美国、日本没什么联系，很长一段时间欧美的学者没办法来中国留学，就都去了日本，特别是京都大学。我今年58岁，跟我年龄差不多的欧美学者都是在京都

大学留学的,因此我跟他们都是朋友。“文革”后,中国开放了,欧美的年轻学者都到北大来留学了。

中国很长时间都是日本文明的老师,日本古代的许多都城都是模仿中国的。日本最古老的都城是京都,从794年到1867年都是日本的首都,有1000多年的历史,随便在哪里挖都能挖出文物来。日本文明是模仿汉字文化、汉字文明而发展起来的,特别是13、14、15世纪日中的交流非常的频繁,那时的日本佛教实际上就是中国佛教,日本从中国买了很多宋版、元版的书。在中国宋版、元版流传的并不多,日本却有很多。日本有许多专门收集中国古籍的机构,但比它们拥有更多宋版、元版的是以京都为中心的寺庙。日本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战争,这些寺庙里保存了相当多的古籍,究竟有多少,现在还不清楚。我想去看他们不让,也许是因为古时候他们买这些书花费了很多钱。我认为这些寺庙里的宋元版书是世界文化遗产,在这我有一个提议,就是希望北大的诸位,最好是中国政府,向日本政府建议来调查这些古籍。

我今天讲演的主题是从世界史的角度来看中国。以往认为四大文明中黄河文明是最晚的,但我认为黄河文明很古老。实际上关于四大文明有两个谎言。世界上的文明不只有四个,应该有许多,八个、九个、十个,都有可能,在南美也有。最早提出四大文明说法的是日本著名的学者江上波夫,他是东京大学的考古学家,战前在中国做过考古工作。我认为四大文明的说法产生了很坏的影响。比如说尼罗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基本在一个地方,长江文明和黄河文明从大的方面来说也可以看成是一个。当然,各位也许不同意我的看法。

关于“文明”这个词我想谈一谈自己的看法,一说到文明我们就想到英语的 civilization 和法语的 civilisation,这个词实际上是18—19世纪法国的政治家、历史学家基佐发明的,它来源于罗马时代的拉丁语 civis,19世纪到20世纪前半期,英国和法国认为自己在人类历史上处于一个特殊的位置,英语的 civilization 和法语的 civilisation 只是发音不同。在亚洲国家里日本是最早西化的,日本把英语和法语的这个词翻译成了“文明”,“文明”实际上是个日语的翻译词。这个词来源于《易经》,近代日本用中国的汉字来翻译西方的事物,中国、韩国、越南都是用的日本的翻译词。civilization 和 civilisation 这两

个词本身并不坏,但难以接受的是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等认为自己是文明的,亚洲的各国是野蛮的。日本为了成为西方所谓的文明国家在拼命地努力。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文明”这个词特别流行。福泽谕吉的《文明论之概略》是很畅销的书。英、法、德等国要将亚洲文明化,并认为这是自己的使命。“文明”是他们创造的一个具有歧视性的词,大家如果能够找到一个替换它的词当然更好。

从世界史的角度来看,有一个国家很重要,那就是古代的亚述。它位于今伊拉克北部,巴格达附近,是一个以游牧为主的帝国。伊拉克 19 世纪受英国的殖民统治。英国是一个很恐怖的国家,它把自己统治区的文物都运回了英国。今天伦敦大英博物馆的一面墙上全是亚述的壁画,我 30 年前头一次看到,当时非常震惊。亚述帝国分前半期和后半期,前半期相当于中国的夏,后半期相当于殷商,两方都出土了青铜器、碑文和战车。一般认为中国文明比较晚,但我认为和其他文明应该是同时期的。亚述语中把东方叫 Asu,西方叫 Ereb~Irib,这个说法原样地传到了希腊,Asu 意思是太阳升起的地方,后来就成了“亚细亚”,西方叫 Ereb~Irib,意思是夕阳西下的地方,后来就成了“欧罗巴”,近代欧洲国家认为自己的原点在希腊,我认为这是不对的,(在黑板上画图)下边是埃及,这边是亚述,这是伊朗,这是希腊,实际上是一个文化圈。我们原封不动地接受了欧洲人的说法,其实这些说法是不正确的。

下面再说说亚历山大大帝。古时候有一个阿契美尼斯王朝,比较大,也比较先进,而希腊比较小。但近代欧洲认为首先有希腊,再有罗马,再有欧洲,如果希腊不先进的话他们会很麻烦。古代伊朗语我不是非常好,但是稍微懂一点。我想说的就是欧洲所说的那些事,基本都是幻想。亚历山大大帝在欧洲看来他是英雄,但是实际上他并不是英雄。他是一个比起阿契美尼斯王朝来有点野蛮的马其顿王国的国王,他跟这个比较大的比较先进的阿契美尼斯王朝打仗的时候,偶然地赢了。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实际上亚历山大帝国就只有三年,只有三年的帝国怎么可能会对世界有那么大的影响。对我们亚洲人来说特别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佛像的问题。那么,希腊的文明传到了东方,东方的文明发生了变化,这叫古希腊化。有那么一个说法就是,亚历山大东征的时候,他和印度发生了接触,接触的结果就是产生了佛像。按

以往的说法,印度的社会里是没有做佛像的习惯,而希腊人就有把神变成人的形象,就是用个石像来表现出来的习惯。那么,欧洲的说法是古希腊的神话传到了印度的西北部,和印度的文化发生了接触。恐怕大家到现在为止都是那么学的,但这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因为亚历山大大帝是公元前4世纪的人,但是在印度找到的最早的佛像,是公元后1世纪,这至少有400年的时间差,这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可笑的事情。400年的差你怎么解释?400年的空白你怎么解释?印度的佛像实际上是诞生在什么地方呢?这是最近才明白的事,德里的南边有个城市,实际上是在那里诞生的,那里出土的佛像脸是圆的,是东方人的样子,那个地方的石头比较像沙子一样,这个公元前就已经有了。按以前的说法就是古希腊文化传到了印度,然后产生了佛像,那完全就是一个“小说”。

近代欧洲的确做了很多很不错的东西,但也做了很多错误的事情,其中之一就是:19世纪的时候,它以它海军的力量来侵略亚洲,实际上是认为希腊和罗马是民主制的,认为自己接受了希腊和罗马文化而侵略别的国家是很正当的。要谈这个话题恐怕要谈一天,为了节约时间我就不谈了,我想说的就是现在我们的社会已经是一个人类史、世界史的这么个时代了,作为历史学家来说,首先是哪个是正确的哪个是错误的必须要弄清楚。我经常去欧洲,和欧洲的主要学者也都认识。实际上,欧洲那些主要学者,他们心里也明白,但是一般的民众、一般的国民他们还是原来那个想法,就是欧洲它有意识地犯了这个错误和无意识地犯这个错误,我们亚洲学者有必要给他们纠正。

关于雅利安人这么个说法,其实是英国人为了统治印度而编造出来的说法。就是有一个叫威廉琼斯的人,以前他在东印度公司工作,他原来是研究梵文的,我以前学过一些梵文,大家要是学一些梵文的话,就会发现梵文和英文、法文、德文多少有点像,我是19岁开始学习波斯语的,那时觉得波斯语和英语很像,恐怕那个时候,威廉琼斯他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有一点,就是人种和语言不是一回事,比方说如果是印欧语系,这个说法也许可以成立的,雅利安人这个说法就不大对了。因为他们只是为了说英国人、法国人进入殖民化之前,欧洲人已经到那儿了,所以他们到那里是很自然的结果。他的说法

其实是有这么个政治目的在那儿的。人种主义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比方说纳粹德国就是这样的，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支撑纳粹的理论学说就是这个雅利安人的说法，在日本的学者当中也有同意雅利安人这个学说的，我是完全反对的。

中国文明什么时候开始的，到底有什么东西，要更清楚的向世界发出信号。当然研究中国历史是没有问题的，但我觉得更应该从世界史的这个角度来把中国文明很好地正确地定位，它是如何在整体的世界史范围内发展的。应该怎么来做？由于时间关系，我想讲最后的部分。日本的都城摹仿了中国的长安和洛阳，正如大家所知，关于中国的都城规划什么的，在《周礼·考工记》里边都有详细的记载，这个对中国古代的建筑有很大的影响，这是在公元前1世纪。几乎是完全同一时期，在印度同样的一本书就是《实利论》，那里边几乎完全一样的东西，因为我不会用电脑，所以不能用ppt演示给大家看，上面《考工记》，下面就是印度的，正如佛教进入到中国一样，实际上中国文明和印度文明的关系非常的近。

现在谈一谈纸，中国对世界有很多的贡献，给世界贡献了非常多的礼物，其中之一就是纸。在中国纸的出现有各种说法，但是目前比较倾向于公元前250年。纸很快就传到了朝鲜半岛和日本，这大概是在600年到610年。往西边传就是在750年，无疑是传到撒马尔罕，就是唐和阿拉伯人打仗的时候。传到巴格达是795年，传到开罗是900年，他们用来写阿拉伯语，950年传到了利比亚，1100年传到摩洛哥的非斯(Fez)。传到意大利是1268年，实际上那是蒙古皇帝给罗马教皇Innocentius四世一封信的时候，那封信用的是纸，因为那个时候欧洲没有一个人知道有纸，在意大利造纸的工厂产生于1268年，第二个是1273年，第三个是1283年。纸在欧洲是非常贵重的东西，那之前用的都是羊皮，我觉得那个时候产生文艺复兴是很难想象的。

从明年开始我打算去意大利调查二、三年，在意大利有非常多关于东方贸易的材料。为什么会这样呢？1868年之前，意大利分成好多小国，也就是说那个时候威尼斯是威尼斯，米兰是米兰，都是不同的国家，每个国家都有一个图书馆，那里的东西应当整体上去做调查，但现在还没有人做。大概是20年前，我和日本国家电视台NHK制作了五个电视节目，这对NHK是一个重

大的事件,是日本向世界发出的信号。那个时候我虽然自己不能去,我就拜托 NHK 的人帮我查了一下威尼斯的资料,那方面的资料虽然不多,但是宋元时期意大利与各地之间的关系基本上就明白了。历史的文献是这样的,有知道的,也有不知道的,因为不知道所以不重要,其实不一定。

我认为 13、14 世纪以后的世界史恐怕还有很多要改进的余地,为此,需要懂多种语言,那个时候中国是个什么样子呢?意大利刚刚有纸,之前都是羊皮,而那时中国已经印刷了很多的宋版元版书。那我举个例子,就是《农桑辑要》。在上海图书馆收藏有两种《农桑辑要》,一种是大字本,非常大的体积,还有一种是小字本。实际上那个时候同时做了大字版和小字版,都是同时做的。原版的《农桑辑要》一次要印 1000—1500 部,1500 部是什么意思呢?当时中国所有的县加在一块大约是 1500 个,实际上就是每一个县给一部《农桑辑要》。一般来说,木板印刷一次印二百部的话,基本上这个版就坏了,但是这也要看情况,国家制作的话,它会用好的木材,也有很好的技术,如果不好,也不会一次印二百部了,实际上把所有《农桑辑要》拿来计算,总共印了 15000 部。东和西到底哪个先进呢?仅从这一点来说,东方远远超过了西方。我顺便说一下,《农桑辑要》传到了伊朗,然后用波斯语写下了,这有记录。在座的有一位王一丹女士,她是波斯文专家,希望她来研究这件事情。研究波斯文的《农桑辑要》,中国文献她能读,波斯文献她也能读,两个条件都具备了。

作为研究者其实有两个做法,钻某一门钻的很深,这个当然也非常不错,还有一种就像我几个专业领域都做,这两种方法都需要,钻研的很深和钻研的很广泛。超越人种和国界这么去做的话,真正的世界史和人类史我们就能看得到。我再说一个王一丹女士非常了解的事情,我和她都读同样的史料,即拉施特的《史集》,虽然是波斯文的,但是里边包含了很多中国的史料,拉施特恐怕是犹太裔的伊朗人,在书中详细地列举了汉字的优点,他是怎样赞扬的,大家可以请教王一丹女士。

其实时间已经超过了,我再说两点。东方一直是超过西方的,中国一直比西方先进的,怎么会发生逆转的呢?转折点是在明朝。就像大家所知的,在宋元时代,中国有很多船到了印度洋,那个时候东西方贸易是中国的船和



阿拉伯的船互相合作完成的。到了永乐帝的时候，这个状态一直是持续的，比方说郑和的船。有一个说法是郑和的船超过 8000 吨，这是完全不对的，这是谎言，从技术上来讲大概是不会超过 300 吨。我看了东西的史料，在永乐帝之前印度洋其实是中国的海，永乐帝之后的宣德帝整个地抛弃了以前的方针，锁国政策所造成的结果是西班牙和葡萄牙占据了海上的主导权，据我所知还没有人看到这一点。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东方的研究和西方的研究都分开了，各做各的。我研究过西方的史料，那个时候的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船其实非常小，根本没有技术了不起的地方。还有一个人大家可能都知道，就是哥伦布，哥伦布实际上是受了马可·波罗的影响而出去航海的，这个说法是对的。从结果来讲中国禁止出海了，造成西班牙和葡萄牙占领海上的局面。我不是批判明朝，自从蒙古帝国以后，世界变得非常紧密了，如果你退出某一部分，人家就会很快跟进。哥伦布航海以后 100 年，欧洲叫这个时代是大发现时代，我觉得这个说法很无聊，很没意思，最近我们一直在给欧洲的学者施加压力，不断对他们抱怨，他们也慢慢开始反省，于是有一个新的说法，叫做大探险时代，这是一个比较狡猾的说法，自己没有去抢夺东西，只是去探险，没有做坏事，前提是他们知道自己做了很多的坏事，不愿这么说，换了一个比较中性的词。日本研究西洋史的学者做了一个愚蠢的事情，就是西方把这个时期说成是大发现的时期，日本的西洋史学者说如果自己也这么认为的话，就会非常痛苦，于是在 20 年前发明了一个新的说法叫大航海时代。这 20 年间，“大航海时代”这个说法很流行，而我却拼命地想要击溃这个说法。在日本的西洋史学者里边有两个人非常有名，年龄比较大，实际上我们的关系是比较好的，他们自己承认 20 年前说了这个话，创造了这个词。今天我批判欧洲比较多，从 19 世纪后半期开始到 20 世纪中期，欧洲和美国特别跋扈，欧洲和美国他们施行武力的工具叫动力船。正如大家所知的蒸汽机是英国发明的，过了 30 年他们把蒸汽机装在船上。因为蒸汽船的出现，世界史改变了。在这之前是帆船，有风的话，它就会动，如果逆风的话，它也可以走三角，但是没有风它就不能走。变成动力船的话，想去哪里就可以去哪里，而且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可以形成一个舰队，像在陆地上打仗一样，可以运用战术。最有代表性的是美国舰队。日本为了应对欧美也组织了舰队，并和中国发生了甲